

R

remember

记忆

林贤治 章德宁 主编

3

中国工人出版社

REVIEW



REMEMBER

记忆

林贤治 章德宁 主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

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记忆. 第3辑/林贤治, 章德宁主编. -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2.1

ISBN 7-5008-2717-2

I. 记… II. ①林… ②章… III. 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2541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编辑室(010)62005034-220/62379038
发行部(010)62005042/62005049
印 刷: 北京市忠信诚胶印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3.875
印 数: 1~10334 册
定 价: 23.00 元



- 1 **了解杨宪益〔附：读杨诗〕** / 邵燕祥
- 10 **记杨宪益先生** / 如水
- 20 **华风西雨六十秋** / 邹霆
- 24 **旧事二题** / 朱健
- 31 **回想高考** / 赵园
- 34 **不能过去的往事** / 潘军
- 37 **心之蚀** / 徐莉萍
- 40 **我与罗兰在大风潮中** / 中杰英
- 88 **一个红卫兵的忏悔** / 李士非
- 92 **死在理想之地** / 英子
- 102 **罪证** / 孙肖平
- 110 **红心是怎样炼成的** / 杨传珍
- 116 **关于政治与革命的思考** /
 〔德〕汉娜·阿伦特 阿得贝尔特·莱夫 蔡佩君译
- 139 **纪念萨特** / 〔墨西哥〕奥·帕斯 黄灿然译
- 149 **西蒙娜·薇依** /
 〔美〕苏珊·桑塔格 黄灿然译
- 152 **我写《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 /
 〔英〕V·S·奈保尔 黄灿然译
- 158 **文学肖像(四篇)** /
 〔俄〕帕多斯托夫斯基 陈刚政译
- 171 **布尔加科夫和剧院** /
 〔俄〕帕多斯托夫斯基 陈方译
- 182 **谈布罗茨基** /
 〔俄〕安·谢尔盖耶夫 刘文飞译



了解杨宪益

邵燕祥

中国传统文化之于杨宪益，主要的并不在于从而获得典籍中的知识，而在于得其精神，风骨，节操。他浸润于西方文化多年，我以为同样是得自由、平等、创造的真谛，而不仅表现于译事的信达雅。

对杨宪益先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说是酒仙，有的说是名士，有的说是散淡的人，有的说是社会良知的代表，有的说是学贯中西的末代士大夫，有的说是体现传统美德的现代知识分子，有的说是毕生追求民主的真正爱国者，有的说是死不悔改的自由派……当然不是在同一个层次立论，但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宪益其人的一面。杨宪益绝非两面派，但这多面的表现极自然地统一在他的为人处世之中。

我跟宪益交往年头不长，在1993年末写的《读杨诗》一文中，有几处概括了他给我的印象：

杨宪益的学问不挂在脸上，也不挂在嘴上。也就是说，他从来不“吓唬老百姓”，不以其所有骄人之所无。他的学问融入了他全部的教养，平时待人，从不见疾言厉色，酒边对客，容有《世说新语》式的机智和英国式的幽默，都化为寻常口头语，不紧不慢地说出。

看来通体透着淡泊宁静的杨宪益，几乎很难想象他会拍案而起，凛然陈词。然而正是同一个人。有人称之为“散淡的人”，其实散而不淡。他似乎与世无争，乃是不屑斤斤于个人得失，更不齿“上下交征利”；他仿佛十分随和，但他和而不同，面对原则是非，他有所为有所不为，并且率真得毫无掩饰，更没有矫揉造作。

杨宪益不是书蠹，他读历史读活了，他更关注现实这活的历史。他于个人利害是超脱的，但不是不问世事的隐士；他于是非曲直是执著的，但又能不胶着其中，而高出一筹，从历史的高处俯瞰，这样才有了诗……

中国传统文化之于杨宪益，主要的并不在于从而获得典籍中的知识（他在这方面的考据也见功夫，兹不具论），而在于得其精

神，风骨，节操。他浸润于西方文化多年，我以为同样是得自由、平等、创造的真谛，而不仅表现于译事的信达雅。这在我原只是混沌的感觉，这回初读诗集卷首所收的杨氏早年诗作，我以为可在一定程度上作为证明。特别是《雪》和《死》两首长篇五古，都是诗人1932年春即十七岁少作，不但格调高古，诗艺已臻成熟，而且其中已形成的生死观表现了一种透彻的领悟和积极的人生态度，这两者很好地互相结合渗透，是极其珍贵的。

这两首诗对人生和人格作了形而上的思考，但诉诸意象，读来亲切，不觉玄虚。可作了解杨宪益其人的钥匙，亦可作开启杨宪益其诗的钥匙。

而杨宪益作于1993年的《自勉》更为这一切作了明白的注释：“每见是非当表态，偶遭得失莫关心。百年恩怨难须臾尽，作个堂堂正正人。”

这是七八年前我的看法，七八年来这一看法得到更多的印证。但不知能不能得到所有熟悉宪益的朋友们认同。

我和宪益先生是1988年初在著名记者彭子冈女士的纪念仪式上结识的。在那之前，我早就读过他的一些译余随笔，别有会心的考据文字，又从他一些老朋友的口碑和新朋友的记述，得知他的为人。我们过从稍密，则是在九十年代之初，他那被人戏称为“杨氏沙龙”的家里，已经门可罗雀的时候，我那时还没有被医生责令戒酒，于是相与持酒谈诗——自然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打油诗”。这种忘年之交，诗酒之谊，要在随兴之所至，谈笑风生，他既不查我的三代，我也不问他的身世。因此，多年下来，我除了知道他出身名门，负笈牛津，结缡海外，回国报效，直至热情迎接南京解放这样一个轮廓以外，于他在1949年以前的经历知之甚少；而1949年后，也仅知他和戴乃迭夫人共同从事把鲁迅著作和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向英语世界译介的工作，日以继夜，字斟句酌；至于他的蹭蹬他的厄运，怕触痛他们老夫妇，我是从来不问的。虽然觉得读其诗、聆其教足矣，但听说他有口述自传出版，也曾很想一睹为快，后来才知道那是外文，相隔太远了。后来不断听说有人找他访问，但发为文章的不多。今年有李辉先生关于他们贤伉俪的图文并茂的著述加入“大象人物聚焦书系”出版，最近又欣闻邹霆先生以十余年之功写出了宪益的传记，我想，不但对杨宪益知之不多的人可以从而识其人，我也可以从这里补我所知之不足。

我在前面所引1993年对宪益的印象，已经是晚年“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杨宪益，已经可说是一代典型。然而，“这一个”杨宪益，是怎样从津门少年、牛津学子、爱国学人、民主人士，一步一步走来的呢？有心

而杨宪益作于1993年的《自勉》更为这一切作了明白的注释：“每见是非当表态，偶遭得失莫关心。百年恩怨难须臾尽，作个堂堂正正人。”

人或可在这部传记中寻到踪迹。

按照过去习惯的说法，宪益的出身属于膏粱之家。这样人家的子弟，有的声色犬马，贪婪奢侈，但也并不尽然。不少人从小衣食无虞，什么都享受过，见识过，反不像某些出身贫寒的人那样容易耽于物欲；宪益日常不善自理，看得出幼年失怙，作为众姐妹群中“独苗儿”的少爷公子，“生于深宅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烙印，这一点有些像“但知饱食，不谙他务”的样子，然而他终生能淡泊自处，不但不懂得斤斤计较，而且大事小事都与工于心计的人大异，这就不仅是贾宝玉式的“潦倒不通庶务”所能解释，多半由于他所受的书本教育的熏陶，加上他笃信书本上东西的那种“书生气”，这份书生气成全了他的责任感，他的正义感，他的道德感，也使他隔绝了政客的权变，市侩的机诈，乡愿的伪善无特操，文痞文丐的蝇营狗苟。我一直相信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性格大抵在十几岁时就已形成。少年时代中西优秀文化给予杨宪益的影响，到老都看得出来。他对人间不平事的愤怒和悲悯，无所顾忌的指斥和抨击，依稀“少不更事”

的率性天真、“少爷脾气”（这一点倒与“廖公子”承志同志有某些相似之处）；他在逆境中的随遇而安，显然沿袭了小时候以“好玩”“有趣”的审美态度看取生活。而这一切，都让我想起“二分梁甫一分骚”的陶潜。当然，任何比拟都只求近似，时代不同，世情自异，天下并没有雷同一响的事。

宪益的多面——看去，线索清楚，逻辑分明，不像有些人的性格表现由复杂而濒于混乱，甚至不合逻辑。大约不仅是他的妹妹和家人会从他身上看到他几十年前青少年时代的影子。然而，他虽年事已高，却还在与时俱进，他生活在不断的思考中。最近读《寻根》杂志，他对若干年前的旧作，逐条附笔加写了近年思考所得，是之谓“推陈出新”，此老的生命力令人惊异。

我相信读者会从比较翔实的传记中，对杨宪益增进了解。只有了解了，才能从他的生平得到更多的启示。

2001年4月4日

青年杨宪益、戴乃迭在英国



读 杨 诗

杨宪益的学问不挂在脸上，也不挂在嘴上。也就是说，他从来不“吓唬老百姓”，不以其所有骄人之所无。他的学问融入了他全部的教养，平时待人，从不见疾言厉色。酒边对客，容有《世说新语》式的机智和英国式的幽默，都化为寻常口头语，不紧不慢地说出。

看来通体透着淡泊宁静的杨宪益，几乎很难想象他会拍案而起，凛然陈词。然而正是同一个人。有人称之为“散淡的人”，其实散而不淡。他似乎与世无争，乃是不屑斤斤于个人得失，更不齿“上下交征利”，他仿佛十分随和，但他和而不同，面对原则是非，他有所为有所不为，并且率真得毫无掩饰，更没有矫揉造作。

有斯人，然后有斯诗。

可以说人是真人，诗是真诗。

知其人才得以知其诗，知其诗便更能知其人。

有斯人，然后有斯诗。

可以说人是真人，诗是真诗。

杨宪益常自谦他的诗是“打油诗”，如果以为他的诗止于“打油”，那就看得浅了。我宁愿把他的标榜“打油”看作对言不由衷、言之无物的伪诗的挑战，对“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的反拨。

中国传统诗中与占主流地位的温柔敦厚相对的，历来有沉着痛快的一派——它不仅仅是一种流派，一种风格，而是诗和诗人主体的一种精神。

这种精神有时表现为嬉笑怒骂，但是远远不限于嬉笑怒骂的。

诗，在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中，更不必说比起诉诸公众的小说和戏剧，无疑是最个人的，或说最富于他人色彩的。它往往甚至必须最直接地表现诗人自己。

读者从杨宪益诗中寻找诗人的影子，首先频繁遇到的是自嘲的语态。

1990年初，旧历新正，我到杨家作客，夫人戴乃迭送我一小盆刚分蘖的小苗，姑名之为“洋水仙”；宪益给我一张纸片，上面写着新作的七言绝句题目就是《自嘲》：

清淡夷甫终无用，击鼓祢衡未必佳。

差似窗前水仙草，只能长叶不开花。

这里也许有宪益的自嘲吧，但我以为也有对我这一类知识分子的批

评，凝结了忧患时世和历史经验的思考。我默对着窗台上已谢、正开和未曾结苞的水仙，久久失神，不知说什么好。

杨宪益的自嘲中，不管诗人自己意识到没有，总是包含着自我肯定，此所以于“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之后，继以“蹉跎惭白发，辛苦作黄牛”；从1988年的“作诗人党两无成，只合文坛做散兵”，到1990年的“有酒有烟吾愿足，无官无党一身轻”，寓自尊于自嘲中，最终完成了人格的尊严。

杨宪益以潇洒的自嘲取得了讽世的资格。“早起翻书看不清，眼球充血又何惊”，一个闹眼的惶怍老汉的形象总不会成为歌颂的对象吧？“此身久被洪炉炼，火眼金睛是老孙。”看他用洪炉一句把半生坎坷说得何等轻巧，差幸炼出火眼金睛，洞察妖魔鬼怪，至少是“白眼看鸡虫”，“冷眼观螃蟹”，以老孙自我解嘲，这就同阿Q的自虐和自炫划清了界限。

宪益好酒，曾被以好斗整人为能事者上纲到“腐蚀青年”的高度，宪益一笑置之。交往较多的朋友都知道他不是那种耽于口腹之欲的饕餮之徒。吟到筵宴，包括他所嗜的酒，常出诸自嘲的口吻。“千金一掷豪门宴，川北江南正断粮”，“主人盛意情难却，忽忆江南有饿殍”，“郴州到处打秋风，整日消磨饮宴中，归载柑橘三百颗，主人惊道过蝗虫”：诗人没有演出“罢宴”的英武的场面，但从这自嘲以至自责的诗句，不是分明可见白居易新乐府式的诗心么？至于“闲来无事且干杯”，“饮酒莫谈家国事”，则使人有生处乱世的魏晋风度的联想，如他1993年一首诗中所说，“我自闭门家里坐，老来留个好名声”，不趋时阿世，不同流合污，中国传统士人“独善其身”的境界，也是不该深责的吧？

然而，不，杨宪益并不是借酒遁世的人。诚然他有借酒浇愁的一面，但他不失清醒的信心：“何须一醉解千愁，东方不亮西方亮。”他的仍然笼罩着自嘲意趣的《祝酒辞》说，“值此良宵须尽醉，人闲难得是胡涂”；《谢酒辞》则说，“值此良宵虽尽兴，从来大事不胡涂！”

好一个“大事不胡涂”，透露了诗人醉醉醒醒的奥秘。此京华酒徒非彼世俗贪杯之辈所可比拟也。人说宪益是“酒仙”，其实他更接近于一首或是伪作的所谓曹雪芹诗中“潇洒做顽仙”的“顽仙”。

诗是表现自己的，但不能只在自己身上落笔。

于是自嘲之外，我们又读到杨宪益的讽世之作。鲁迅曾引“暴君的专



杨宪益与黄苗子、邵燕祥合著的打油诗集

好一个“大事不胡涂”，透露了诗人醉醉醒醒的奥秘。此京华酒徒非彼世俗贪杯之辈所可比拟也。

制使人们变成冷嘲”，并申冷嘲与热讽之辨。用来读解杨诗，却不能胶柱鼓瑟：无冷眼不足以洞达世态尤其是伪装下的真相，无热肠不足以宣泄义愤尤其是久被压抑的真情。

诗人 1976 年所作《狂言》该是在江青等刚刚垮台以后，“老夫不怕重回狱，诸子何忧再变天”，一派乐观；1978 年却已叹息：“从来风派难摸准，莫怪今天气象台”；1981 年深感积重难返：“早望退休心未遂，空谈精简事难能”；1989 年则惊呼：“教授如今成饿殍，豪商多半靠高官”。固然世事未能尽如人意乃势之常，但辜负人民信任和期望，违反人民意愿和利益的种种世相，不能不使诗人感到无法忍受了。

杨宪益的近作，1993 年的《无题（回到京城又半年）》，《银行》，《百万庄路景》，《有感》诸首，已从讽刺进为抨击，不是不可理解的。杨宪益深受老庄的影响，但这并不排除他曾受民胞物与、己饥己溺的儒家精神的熏陶，因此在 1993 年 9 月闻青海省有水库决堤，他当即写诗书愤：“青海千村付浊流，官家只管盖高楼”，他沉痛地写道：

举世尽从愁里老，此生合在醉中休。
儿童不识民心苦，却道天凉好个秋。

无冷眼不足以洞达世
态尤其是伪装下的真相，
无热肠不足以宣泄义愤尤
其是久被压抑的真情。

满腔悲愤的伤世之情倾于笔端，这里写出一个热爱人民、痛恨官僚和一切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利益者的诗人回天无力的无奈。杨诗从怨而不怒，到怨而怒，又一次证明了“愤怒出诗人”，这样的诗出于社会的良知。

杨诗的讽世、骂世皆为警世。然而这样的风骨之作鲜见于今日之报刊，“正声何微茫”，岂自今日始！

杨宪益术业有专攻，是那种无心为诗人，更不会刻意去做诗，然而信手拈来，率多佳什的诗人。

如《兴城杂咏》，写到兴城为古孤竹地，城外有首山当即首阳山，是传说中孤竹君之二子伯夷叔齐采薇之地：

殷墟孤竹势难全，岂是存心要让贤。
国破家亡无路走，只能逃到首阳山。

自注说“夷齐兄弟让位，乃儒家无稽之谈，不足信也”，一下戳破历史上夷齐让位连带许多“禅位让贤”的鬼话，卓越的史识仿佛随口说出。

又如写到兴城古城即明末宁远，联想宁远守将抗清有功的袁崇焕遭谗被杀和副将祖大寿叛明降清：

宁远经营大将材，满门抄斩亦堪哀。
功高偏受君王忌，不见今朝彭德怀？

祖氏石坊今尚存，袁家斩草尽除根。
崇祯总是昏庸主，不信忠臣信叛臣。

他读历史读活了，他
更关注现实这活的历史。

杨宪益不是书蠹，他读历史读活了，他更关注现实这活的历史。他于个人利害是超脱的，但不是不问世事的隐士；他于是非曲直是执著的，但又能不胶着其中，而高出一筹，从历史的高处俯瞰，这样才有了诗，有了那些不仅基于语言敏感，而且同识见分不开的，语浅意深的妙对，如“好汉最长窝里斗，老夫怕吃眼前亏”，题为咏五次文代会，但它所概括的岂止是文坛一隅呢？

宪益以俗语入诗，以俗为雅，以俗胜雅。游深圳西丽湖的“西丽湖图一梦中”谐“稀里糊涂”，另诗“酒精考验金刚体”谐“久经考验”，不用说了，其1984年赠黄苗子诗“欣逢盛世休装老，预祝明朝更有钱”，1992年在天津提到乃迭在海南，“莫念鹿回头老伴，何须狗不理汤包”，1993年念及聂绀弩的“不求安乐死，自号散宜生”，“何惧黄金印，焉忧白骨精”；凡此，都如聂绀弩诗一样，为旧体格律诗注入思想、感情、语言的新血。

中国传统文化之于杨宪益，主要的并不在于从而获得典籍中的知识（他在这方面的考据也见功夫，兹不具论），而在于得其精神，风骨，节操。他浸润于西方文化多年，我以为同样是得自由、平等、创造的真谛，而不仅表现于译中的信达雅。这在我原只是混沌的感觉，这回初读诗集卷首所收的杨氏早年诗作，我以为可在一定程度上作为证明。特别是《雪》和《死》两首长篇五古，都是诗人1932年春即十七岁少作，不但格调高古，诗艺已臻成熟，而且其中已形成的生死观表现了一种透彻的领悟和积极的人生态度，这两者很好地互相结合渗透，是极其珍贵的。

这两首诗对人生和人格作了形而上的思考，但诉诸意象，读来亲切，不觉玄虚。可作了解杨宪益其人的钥匙，亦可作开启杨宪益其诗的钥匙。

而杨宪益作于1993年的《自勉》更为这一切作了明白的注释：“每见是非当表态，偶遭得失莫关心。百年恩怨须臾尽，作个堂堂正正人。”

1993年12月22日



晚年穿上道袍，却也曾遁世



杨宪益与丁聪

记杨宪益先生

如 水

1990年的春天，我在北京香山巧遇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和漫画家丁聪先生，他们坐在两棵参天蔽日的大树前交谈。我禁不住叫出声来：“两棵大树，两位老人，真是好象征！”杨先生连连说：“不敢当，不敢当！”

的确，像杨先生那样经过风吹雨打依然繁茂挺拔者，大概只有那棵大树可以与之相比拟，且枝叶动而知风云变，杨宪益也正是这个风云变幻莫测的时代的见证人。

杨宪益为人与境遇

古人说：“读其书，诵其诗，不知其人，可乎？”

杨宪益的学术成就举世公认，连嫉妒他、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俯首称是。要知道杨宪益为人与境遇的关系，却没那么容易。他一生谦和淡泊，对朋友尤其真挚宽厚。好像一举一动都是在尽一个老实人的本份。这样的人，社会还不容他么？再看看他的境遇，却令人不解了。早年在伦敦留学后就归国投身抗战，盼望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的建立。可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历次运动中都受牵连、迫害，文革期间竟被打成外国特务，关进牢房。他追随共产党数十年，改革开放后才得入党，几年之后又退出来了。这件事，他也是习惯于先检讨自己：“我什么事都要讲话，纪律性不够强，所以看起来我不够一个党员的资格。”有人给他出主意说：“你说你是喝酒后说的胡话，认个错儿，不就过关了吗？”杨宪益说：“说这些话是上午，我上午一向是不喝酒的。我今天还是这样的看法。”在圆滑取巧这一点上，杨宪益七十八岁了还没有开窍，恐怕永远也不会开窍了。

即便是对自己不利，也要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他绝不后悔。这就是杨宪益为人的简单概括吧。他对社会尽职尽责与社会给他的回报，并不成正比关系，这是什么道理呢？很耐人寻味。

正常的人的优点在不正常的社会里会变成缺点，当然要倒霉遭殃了。

英伦留学，奠定生活模式

杨宪益的父亲杨毓璋先生是一位开明的银行家，曾任天津中国银行行长。1936年杨宪益中学毕业以后，自费赴英国留学于著名的牛津大学。与他在牛津同时的中国留学生中还有钱钟书、向达等。不过钱钟书是大学毕业公派庚款留学生，年龄比杨宪益稍长几岁，当时已才华横溢，锋芒毕露了。牛津留学时，杨宪益就把《楚辞》翻译成英文。从此，杨宪益一直热衷于把中国古典名著介绍给外国读者。解放前陆续翻译了《聊斋志异》、《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在南京编译馆时期，又翻译了《资治通鉴》（从战国到西汉部分）。当时他的同事中，有梁实秋、卢冀野。他的这两位朋友各有特点，写过大量闲适小品的梁实秋自有其创作的源泉：他好吃贪玩；卢冀野是个大胖子诗人，有人谑称之为：“文似东坡，人似东坡肉”。可惜都已先后作古了。

杨宪益大学同窗，有一位钟爱中国文化又热爱杨宪益并终于成为杨夫人的格拉蒂丝（中国名字是戴乃迭）。这桩异国联姻对杨宪益一生影响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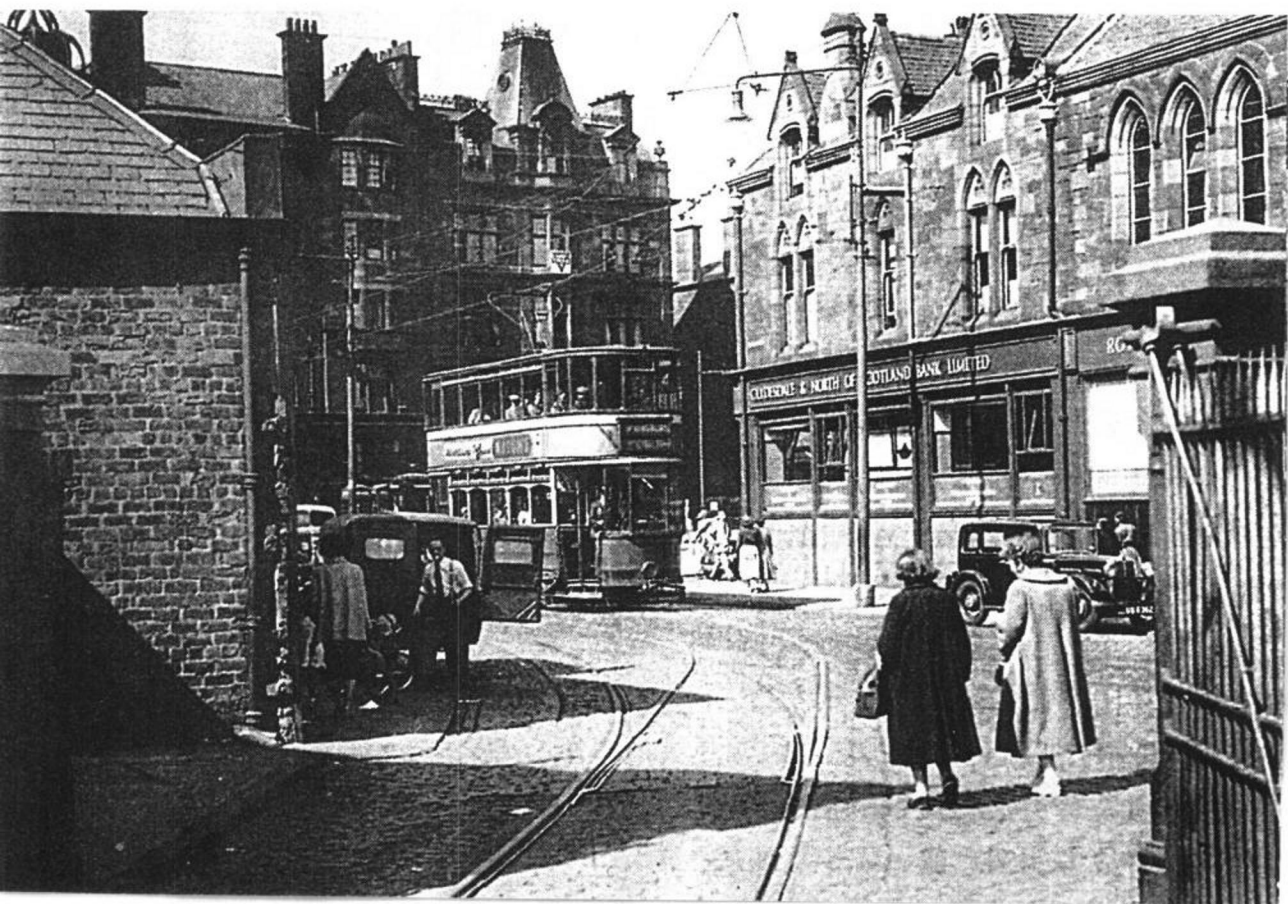
丁聪笔下的杨宪益

大。他们夫妇生活上互相“宝贝”，合作译事则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他们合译《红楼梦》既是文坛盛事，亦是文坛佳话。后来根据他们的英译本翻译的西班牙文和缅甸文《红楼梦》相继问世。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终于冲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这真可称为志同道合，白首偕老的完美婚姻。

杨宪益不是一个死做学问的人。他秉承了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传统。当学生时就对国家的命运忧心忡忡。抗战初期，他和向达、吕叔湘在伦敦办过一张专门给华侨看的中文报纸《抗战时报》，向华侨提供各地抗日的消息。他在牛津获得硕士学位后，连学位典礼都没有参加就急匆匆地赶回国内，参加抗战。杨宪益说：“那时的爱国青年，学成之后，一心只想报效祖国，没有人想在国外呆很久。”对杨宪益而言，这样做也是最自然不过的了。

杨宪益留英之时表现出来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称得上所谓“又红又专”吧。当然，没有什么领导会这么评价他。而这终其一生的素质，是不是天性呢？

杨宪益留学英国时的
伦敦街头



自传变成运动史

1952年，杨宪益应刘尊棋之邀，来到北京外文出版局工作。当时他在南京政协担任副秘书长。这是杨宪益一生唯一的官衔。那时的南京市市长是柯庆施。杨宪益说：“柯庆施是我的安徽同乡，有时还一起吃饭喝酒。他也不坐专车，看起来挺好的。后来如果我跟他一起到上海去，就会被他当作特务处理掉。我的很多朋友的死都和他有关系。”这就是民间所谓“笑官打死人”吧。

解放前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解放后都受到或多或少、或迟或早的怀疑、排斥和打击。杨宪益虽在解放前为共产党做过地下工作，这时也必然不信任。反右时，还有正直的人保他，说：“杨宪益恐怕不够右派吧。”他没划右派，却叫他“漏网的右派”。文革时他被怀疑是外国特务，关进牢房四年。1968年的一天晚上，把他抓走，说是“逮捕”，四年以后放出来，又说是“拘留”。放出来时是用一种“抓你也对，放你也对”的逻辑，说，他没什么大问题，也为人民做了点工作。坐牢时对杨宪益没有体罚，可是精神折磨不断，那时常有公审，今天枪毙几个，明天枪毙几个，他们总会来威胁说，限你几个小时坦白，否则如何如何。杨宪益却总是依然故我。

有人问他，解放前夕如果去台湾，他后来的命运是不是会好一点？他笑着说：“不，不，不！国民党对知识分子也不重视，只不过显得在行一点罢了。”

1990年杨宪益用英文写了一本自传，在意大利出了意大利文版。杨宪益写完发现，他的自传就是“运动”史。我们猜想，这本“运动”史，至少有许多可汲取的教训，对我们反思历史终是有益而无害的吧。国内的读者期待着它的中文版早日问世，这大概也符合作者写作的初衷，只怕未必对某些“看官”的口味。

学成半瓶醋

“学成半瓶醋”，这是杨宪益打油诗的一句，当然是他的自谦。杨宪益在牛津毕业时，获得硕士学位。1993年3月4日，香港大学则因他“对开拓学问知识和人类福祉有重大贡献，在文学和历史学上的杰出成就”而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

前面我们提到《红楼梦》的翻译是一桩文化盛事，但无须简单地再三赞美不止。作为一位杰出的翻译家，杨宪益的成就是后来者成功的起点和